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 23 辑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巩义市文史委员会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 23 辑

政协巩义市文史委员会编印

2001年12月

目 录

政 治

- 回忆巩县政治学校.....邵成森 (1)
- 我青年时代的回忆.....刘京兆 (3)
- 我身历的两次磨难.....牛先宾 (13)
- 忆“破四旧”、“立四新”一段往事.....于道昆 (20)
- 1961年“反五风”运动中我在和义沟
集训班.....李 江 (22)

经 济

- 巩义治黄工程回顾与展望.....姚德茂 (26)
- 解放前芝田农民的差税负担.....刘进境 (53)

文 化

- 杜甫陵园修建记.....张鑫琦 (56)
- 巩县豫剧团两次演出盛况.....张国瑞 (74)

原巩县曲剧团始末·····	张国瑞 (79)
组织农村文艺宣传队的始末·····	张国瑞 (86)
张日新和他的泥塑艺术·····	张保初 (90)
袁世凯手书墓表·····	阎国宝 (95)
我在强华女校和巩县简易师范片段···	张光沂 张国瑞 (97)
巩义市风景名胜简介·····	张文江 刘洪森 张毅敏 (102)

少数民族

虎进忠家史回忆录·····	虎进忠 邵成森 (122)
---------------	---------------

其 它

皮定均治军三例·····	左雪文 (138)
刘镇华的家世与家族·····	谷国泰 康永奇 (140)
日本人的“防疫针”·····	崔振普 (142)
巩县兵工厂南迁纪事·····	崔宗祥 尚世保 (144)
从长沙到烟溪·····	孙同修 (146)

文史资料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曲夫振 (174)
--------------------	-----------

附：省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大纲·····	(186)
--------------------	-------

政治

回忆巩县政治学校

邵成森

解放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巩县是省、开封地区统战工作的重点县。因巩县有小上海之称的回郭镇，烟厂业、花布业、工商业者较多，南河渡又是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的家乡，国民党军政人员较多，相应的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知识分子也比较多，所以统战工作省地市领导常在此做试点。

一九五九年我任县政协秘书期间，于十一月卅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县委员会政治学校”。这在开封地区和郑州市各县区还是第一家。当时办校目的主要是贯彻中央“驰”的精神和对各界民主人士五不变政策（即高薪、定息、政治安排政策、学衔、改造政策不变），加强对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

当时国内已处于三年自然灾害，苏修撤专家、逼债，美国支持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等非常复杂困难时期，各界人士又经过前两年反右派斗争、交心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心存余悸而不安。为解决这一问题，保证社会安定团结，我们决定以办政治学校的方式更新、提高干部思想。在学习中主要采取请县、市有关领导等人为教员，讲形势、讲政策，学习有关中央文件，学习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和哲学著作等。同时还参观一些水利建设和工农业生产。

参加学习的人员主要是：文教、卫生、工商、民族宗教中的上层骨干和开明士绅、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等一些社会人士。学习每期半个月，每期五十人左右。学校地址设在孝义

镇外沟村沟内（原四三一国库）一个大院内，院内有五孔土窑洞，五间会议室，二间伙房。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县委破格给批买了三十张课桌，六十个木凳子和住宿铺席等学习用具。

在管理上，国家机关精兵简政，那时县政协与县委统战部两个部门共只有杨瑞笃和我两个人（一个部长一个秘书），在一块合署办公，部长杨瑞笃还经常下乡搞中心工作。学校从县工商联机关抽调了非常勤恳负责的郑秀茸同志（湖南籍，是个转业军人）管理生活总务。我主要是安排学习，联系县、市有关领导讲课、作报告等。县委对学习人员生活上比较照顾，每天补助二两粮票，吃70%的细粮，油和副食品的供应都比较优厚。学员住的虽没有床只有一条席，但住的是窑洞夏天凉爽，冬天席下边垫麦草很暖和，所以从当时讲生活安排得比较好，学习都较安心。

学习是按照中央提出的“三自三不”的方针进行，即：依靠群众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所以在学习中大家心情比较舒畅，办出了政协特色，起到了安定团结的作用。

同时学校还根据县委的中心工作办了不同人员的学习班，如根据上级要求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日前，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指示，学校将摘掉右派帽子准备安排工作的人员组织休整学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期就组织了五十二人的学习。同时还组织有回族党、团员学习，进行无神论教育，解决自宰自食问题等。

巩县政治学校在各界人士中影响较大，起到了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

巩县政治学校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办。

我青年时代的回忆

刘京兆

我文化水平低，加上年龄已73岁，没有多大精力，现把我
我在旧社会的一些经历做一些回忆。

少年时代，艰难苦险的路程

民国31年，我13岁。河南旱灾，家中把最后的四亩地卖了后，我拿了路费和我紧门叔父刘永往西安逃荒出走。步行到洛阳坐在火车皮顶上，背着被子衣服等，上边还有逃荒的小车和其他家具，过山洞不小心就会掉车身亡，不幸之事也有发生。洛阳西常家湾还要步行转车，火车还要闯潼关。因山西省日本人占据，火车过潼关时日本人还打炮，时刻存在着生命危险。

到了西安过上囚犯般的日子

到了西安，找到了本门的乡亲于得成之母，在他的北城壕小窑洞内住了几夜。早晨起来，被子好象经过雨淋，落下了以后生疥疮的毛病，后又经我村于举的介绍，到北关军鞋厂（后迁南关）当学徒，师傅李床林，河北人，师兄弟五人。师傅有时在厂外给鞋铺干活。他有妻子、母亲，还有一个小男孩叫长生，经常在大街要饭。鞋厂的规矩是学徒是奴隶，不准出厂大门，怕吃不了苦逃跑。我是农历十二月进厂来，以后和师兄弟仅出过一次大门。早上军训下操吃饭吹号，定时开饭，令下才能开吃，饭经常不够吃。因为都是逃荒，小孩肚内空，吃得更多。我记得有一次，是分馍吃，每人

四个，一堆五个人，这一次钻了空子，少了三个人，我二人各分一半，发了十个馍，伙房有个老乡姓张，偷给我两个馍，共是十二个，一次就吃完了。中午是最次的红大米，不好消化，经常闹肚子。每天规定的活完不成，棉衣扒掉就用绳子抽。晚上十二点后一般才能把活干完，喝的汤经常是蒸馍水，全厂大约千余人，就一个大伙房，生活不卫生，饱饥不均匀，哪能不生病？睡的是一个屋约五、六十人，两条大通地铺。学徒每天干活有定额，被子衣服没时间洗，身上虱子多，有的是用笤帚扫，有的是用火烤，虱子咬得老厉害时，只好手摸着吃掉，跳蚤好像蚂蚁打架，在睡的通铺跑跳。由于卫生环境差，百分之五十的人害起了传染病，伤寒病陕西都叫羊毛钉，河南叫时期病，干疥脓泡、疥莉疾这都是常害的病，最容易复发。夏季晚上还闹夜惊起哄。传染病止不住时，全厂做了一个小屋大的木笼，轮屋分批把所有的被子衣服用蒸气蒸，这才基本消灭了各种病。受尽了二年苦，师傅准我出师当工人。因为工资低，又结了婚，生活难过，就到咸阳打包厂做小工，因打包厂设施差，空气不好，进厂须要半月的高烧才能继续干下去。所以我就返回家乡，然后去郑州鞋厂干。

一生难忘的48.6、共产党救我见青天

在郑州鞋厂，我听说巩县解放了，就决定不干了，一心要回巩县老家。1948年6月的一天，我在鞋厂领到了工资，中午吃罢饭，出了厂门，顺铁路一直往西走。地里麦已割完，可能是没下雨的原因地里不见一人，铁道闸有的拆了，没有火车。天快黑了，走进荥阳西十里铺街上，街

上的门面房都关了。墙上用灰水写着标语，阴森森的。担惊到了街西头三叉路口处，有杨树枝搭着凉棚，下边坐了五、六个中年人闲谈话，不等他们问，我先问他们往巩县去走哪条路，他们反问我从何处来，我就实话说出来去情况。另一个人还看了我带草帽的帽沿，指了方向走一条一丈多深的沟里，走大约走了二三百步，右边地上边先后两个人，一人拿粪叉又一个人还挑着罗头，先后都是同样的话，问我哪里去，看样子好象在三叉路口问话一伙的人，我内心也有了数，照前实说，顺利过关这时日头将要落，天色是夕阳红色，前边大约有百十步，又是三叉路口，旁边地里趴着三个人，难道是劫路的？硬着头皮往前走，不敢回头跑。正在这时，右边地里下来一个拿粪叉的人，在那三人身旁走了一圈。因为三个人不动，我心里见另有人来，也有点震惊感觉，就在这一分钟时间内走近到三人近处，呀，我身上都成了鸡皮疙瘩，那三个人为啥都没有头？！我再也不敢多看一眼，加快大步直往西走。约走一里路，天也黑了，左边地里有麦场，我和俩个看场的人说了好话，准许在场里睡一晚上，当晚在未打的麦堆睡下，也忘记了饥渴。大约三四点钟，树上鸟叫，不告而别顺路直往西走。中午到了孝义，晚上与家里的人说话，亲友们说八路军如何好，咱村刘元善、刘元鑫都参加工作了，县政府现在西黑石关。我当晚就决定投奔八路军干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二天我一早起身，就去黑石关县政府找工作。走到东黑石关铁路桥头税卡处，见到老乡刘元鑫，他答应帮我。当天晚上住户家门外放张桌子，我就住下。第二天见到了谭玉

报，我们二人还是在礼泉石泉中心学校同学，他比我小两岁，见面认识，没说过话，不是同班。同一天和张崇仁局长见了面，也没说多少话。我就算参加工作了。当天晚上，谭玉报带领我们去西黑石关，听徐县长开会，共又停了两天。刘元鑫、老白他二人写税票、收款。过路行商小贩报税的很少，因为当时形势不稳，泗水荥阳还有残余土匪，郑州还有敌人的大部队。在东黑石关停了四天。第五天，张崇仁局长和工商局秘书带着徐保森县长的兄弟徐保九，还有一个青年康运通和我，说的是都去回郭镇工商局开会，实际是调往回郭镇，可能怕我们不去的原因才说去开会。

张崇仁局长、郭海松秘书从东黑石关领着我徐保九、康运通到回郭镇工商局工作，地址是在赵偏子（大名赵京西）院内，当时巩县工商局我所见到的老干部有李丙炎，山西人，好打牌，他长住孝义集；东黑石关税卡刘元鑫、谭玉报、老白，后有吴应本、马光道。税卡取消，吴应本调县工作队，马光道不知下落。回郭镇工商局郭海松秘书，胡林旺写税票，李宏山收款。做饭的是刘宽，黄冶村人。张崇仁局长，老干部，也是山西人，以上这些人是巩县工商财税上解放开始第一批人员。零星后续，有的自动或未加入，自退。

回郭镇柴沟赵光甫（又名赵仁杰）、李宏山，负责收款手续，我到回郭镇先写报税传票，后传票停止，接收胡林旺的税票手续，小黄冶张顾亨这时也参加了工商局，叫他开始发税花纸（烟合上贴的税花）。回郭镇主要是纸烟税，售出厂的纸烟多少箱，必须有税票，前往何处，每合纸烟都得贴

贴税花，每箱纸烟经过驻厂员验过，箱上贴上验收证，即算手续齐全。纸烟没有零售的，都是整箱出售。驻厂员是建国初才有。因工商局人员少，住厂员有的一人管二三个厂。1950年后烟厂已发展到54家，半路停的也有少数几家。偃师姓戚兄弟两人和一个做饭的先后自退。还有一个姓尹的做了一段饭，可能是安徽省或豫东人，来去人很多，后不知去向。48年8月间，河北省老区白鹤令同志，21岁，调工商局，他比我大一岁，我们两人很好，在一个屋住。他主抓税务稽征工作。在这个时候，站街曹光恒和他的爱人，还有一个姓李的老头，回郭镇的马长安，徐县长的弟弟徐保哲，先后参加了工作。站街张维成，正式担任工商股长，山东省刘仙老区的人，正式担任金融股长。1948年9月，工商局买了五部石印机，工人8个，张海亮（解放后任市委统战部长等职，现离休）负责，主要印刷税花，也加工中州市。但是制度很严，晚上、早上石印机都是封着的，不能随便拆封。制度规定我不在意，经常上楼玩。张海亮有政治头脑，很聪明，我们俩人经常谈笑，因为我从小出身工人，好奇心强，有时也替工人绞几下石印机，或许张海亮看我老实的原因，并没有阻止过我，有时他还对我说，没事上来玩。过春节分的饺子各人包，他包的不象话，我还给帮助。张海亮乐于助人，不是小气人，不是勾心斗角的人，这是我不能忘记的。郑州解放，工商局撤销了，印刷加工工人愿参加工作的，分配介绍，愿回乡生产的都已安排。

建国后税务局不包含工商局业务，走上了正轨，人员很快增加到三、四十人。

解放初回郭镇工商局的惊险情况

1948年初巩县回郭镇工商局是第一个经济部门，现在我老了，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我真感到后怕担惊。阳历6月间，孝义镇景沟村两名工作队员被特务杀害后的有一天晚上，黑石关桥头铁道胡洞口，有可疑的人在咕哝活动，当地群众给黑石关桥头税卡上的人报信儿，税卡口的人速迁学校上边一群众家住，住两天后群众又给税卡上的人反映，你们住的窑洞上边一块地内小窑内，晚上有人小声说话，还吸着烟，也不知是干啥的，你们注意。税卡撤消后谭玉报给我说你调这（回郭镇）美啦，我们在黑石关可害怕等情况。

回郭镇工商局是在赵京西（赵偏子）当中大院内两边房，大院中院分三节，正中是大楼，只有四个人经常住着。郭秘书、胡林旺开税票，李洪山收款，一个做饭的约50多岁，姓尹，是豫东人也可能是安徽省的。这时还没有留守驻军，我记得驻军可能是在48年冬季49年正月，他们经常六、七个人在街上排着队走动，穿着灰色棉军装背着长步枪，带着土造圆手榴弹，经常到工商局大门上边小平台上休息。1949年大约三、四月间就不见驻军了，可能是县大队代替了吧，我见尚子和（我的一个亲戚，与以前的一个伪县长重名重姓）带着县大队去过回郭镇工商局。

我是48年6月到工商局的，第二天郭秘书给我匹白骡子，叫我去蔡庄村领税票。可能郭秘书打了电话，已装好两捆，我就骑着骡子驮回来了。又停了两天，康运通带了郭秘书叫我和徐保九，我们三人去镇政府领步枪大约九枝，另外我还偷拿了一枝10子连自己玩，张局长说你那么多拿了一枝？咕哝了一声也没大批评我，又停了几天龚局长和张局

长、郭秘书在擦枪时教我们如何对付敌人，我试枪时没响，把子弹拉出落到脚下才响了，这是最危险的。在这几天情况不好，领枪是为了防御敌人，听说登封红枪会在动乱。同时我正式接替胡林旺写税票，赵仁杰收款，张顾亭发税花，在这时社会上很乱，各派政治力量、各种武装、都拉锯一样，土匪很多。有个姓祖的腰别三八式盒子手枪，还带了两个人可能姓刘，来说要参加工作，他的手枪我还玩了三天，后来我还给他了，张崇仁局长还说我，你呀，还给他干啥，意思是说，他是土匪，你还不趁势把他的枪收了？……我当时想那是他的物件，礼应归还。后来才知道他是土匪，可能是我们知道了他的出身以后，就不见他们三人了。

税票是一张三联有讷封字，收款人必须晚上结账时和税票总数相对款，就在桌子内放着和老式木衣柜里放着木衣大旧箱子存放的也有。当天收的款桌子床上放的都有，堆满了屋子，站街又来了曹光恒（旧职人员）和他的老婆，穿的很时髦，另外还有一个姓李的老头（旧职人员），50多岁，晚上在屋内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多辛苦，这时应该弄点吧，好机会。同时，我的税票发现别人涂改了，后因此人知我发觉，就拖张某人说合，纠正过来算了（后整风时已说明）。

此后工商局的税花也被某人盗取过，当时也被发觉，领导把盗取人当时就开除不用，白主任是在1948年8月份来回郭镇工商局的，一直到现在，不管在哪单位还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沾。因为我们相处几十年并未脱离关系，烟厂私商也有试探行贿的，但没法入手。

1948年—49年上半年，人员大约已有二十人，经常晚上到南坡搜索，不断在马水旺坟上休息。有天晚上约2点

钟，有枪声把我们惊醒，我们不约而同上了楼。停了几分钟有人很紧急地叫工商局的大门，这时才知道街西头布店被抢。土匪进布店时先向店主问工商局晚上是否出来等。又一次在工商局近处也是晚上约2点钟枪响，同志们很快的都上了楼顶，镇反时才弄清是因藏在书店特务在活动，这些特务妄想抢工商局，再抢走一个好妇女当老婆。

我们真忙，郭秘书还代领几人晚上前往回郭镇刘赵村、李邵村突击搜查做假烟的私商，这次回来后还批评张顾亭动手打人，商人犯法做冒牌烟态度不好应该处罚，我们不该违法乱纪，这是党的政策。

在工商局内部镇反时也出现一些情况。一天晚上孔令思去摘申克梯局长警卫员小蔡的枪，被小蔡打了一顿，孔令思这人40来岁，走起路是开门脚一般，个子不高，我和他说不过来，一说话瞪着两个大眼睛，手脚很厉害，我打不过他。

总的说这个阶段来来去去有土匪、有伪人员、有吸毒品、有兵痞，约占开始总人数的一半。在49年建国后，人数已达到40多人，大部份青年和学生较多，新生力量有力、有序安定下来。

1948年4月解放至1952年这个阶段，回郭镇税所是巩县最早的经济管理部门之一，据说对解放战争发挥的经济后勤作用超过两个洛阳，这是事实。详细数字虽然我不知确切，但我在工商局工作时，亲眼实观用大车拉走的银元、钞票、加工的中州币很多很多。从这些经历中，我亲身体会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严庄重；大堆的钱币，随便堆放在屋里的桌上、地下，土匪不敢动、奸商不敢摸，内部工作人员不去沾，回想起来真叫人感慨。后来到1952年初，整风运动

开始，财经部门是重点，曹智局长亲自领导，那么大的运动，回郭镇税所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没一点问题。同年九月我们集中在县委整风半个月，我经受了党的审察考验，在整风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建国初期党组织、经济部门的清白，风气的优良，根本原因在于党员和领导的正派，在于青年的学习上进，在于艰苦朴素优良传统的坚持，在于大环境、大气候的形成。

一生难忘的党和领导及同志

1948年解放开始有了工商局，创史人是张崇仁，他是县工商科副科长，我们都叫他张局长，他和郭海松秘书主持工作、人、地各方面情况不清，需要艰苦深入细致的去做到一切，否则会出大乱子。同时又来一个龚培吉局长（但是我读县党史资料未见此名），来时登封红枪会正在动乱，他在局院内还教我如何防御，技能表演。郭秘书管事最多，人事、生活、工作等，都须他安排。这时又正式调来一个白光局长，我对他印相最深，他好象是知识分子，说话不起高腔，看事物各方面尖锐。他和我谈心，叫我担任会计工作。因为我算盘还不会全打，白鹤龄主任说，他是可靠，但没有会计技能，如何工作？这才在柴沟村找到了赵仁杰担任。几十年过去，白光局长还通过谭玉报问起我这个当了老农民的老部下，张凤岐、曲典生我也更难忘记，他对同志热心、耐心、经常谈心，手拿手教我打算盘、写字，一巧拔千斤，教我学。如：你会加法，减法相同；你会乘法，除法相同，我迷开了一窍。很多的事实感动了我，真是比一家人还要亲。于泽局长最艰苦耐劳，每天吃饭都不顾，洗衣服时间都没有。他爬在桌子上写的啥，咱不知道。脖子上痒了，一抓就

掉下几个虱子，这些局长向来和同志们一样，生活不搞特殊。申克梯、崔克县长和曹治局长，对学习最关心，每天清早白主任领导我们学习一至二个钟头报纸或其他政治文件。因为我在工商局一直作内勤工作，文化水平低，脑子不灵活，跟不上形势，需要锻炼，鲁局长把我调出部门作外勤，锻炼成长，自己才知道啥是社会，啥是政治、人生，如何去工作。后又调县委作审干工作年余，才有了一切的工作基础。审干办公室是组织部直接领导，姬学武是部长。我在腊月时外调未归，组织部长亲自派人到家安排生活，还送到家20元钱，钱的价值不说高低，说明了党组织对同志的关心重。由于外勤及审干工作的锻炼，我记得税局王德祥在铁山村作中心统购时工作失利，作不下去时，区上叫我去突击，我大胆突破僵局完成任务。

张华民同志的辅助金被盗，生活困难，没法过春节，鲁局长帮助筹集几百元，张华民渡过了难关。在工作当中吴云山、康桂甫是作内勤，文化程度比较高，教给我写方块字。理论名词我不懂就请教他们帮助。尤其是我们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革命感情最深，去年鲁局长把全局的50年代各地同志，自酬花费，聚会巩义四、五天续旧情，并且鲁局长还准备每年搞一次，80年代以鲁连丰局长为首，开始带领本市早期在工商税务局的同志有康桂甫、张新立、王士宏、史充丰、李玉坤、孟光梯和我，自酬花费前往开封、洛阳、登封等地看望老同事续旧留念，感情深厚，非同一般。

我一生的最大转折——退職返乡务农

1957年大约8月间，我在小关镇担任组织干事时，退職回乡到家当了农民。因为当时我听说省里有这个文件，我愿

劳动，不愿意当干部，再加上社会安定，可享天伦之乐，我就解职回乡当农民了。

我身历的两次磨难

牛先宾

在极“左”横行年代，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站，首要的一条是保证自身政治上、历史上的“清白”，而扳倒搞臭一个人最有效的“法宝”就是抓住他历史上的“污点”、“疑点”，使他变得“不清白”，然后即可很轻易地将他置于死地。冤狱一旦铸成，加害者有一种虽卑鄙但却保住了自身的侥幸，同时也有一种立功受奖般的胜利感，然后不惜以更卑劣的诬陷，捏造新的事实去掩盖原本的不道德，而某些领导则有揪出了坏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无愧于职责，对起人民对起党的感觉。唯独被加害者，其所受的政治上的摧残、人格上的屈辱、心理上压力、对飞来横祸、无妄之灾的无奈承接，不是改革开放后的现代青年人所能想象到的。

我出生在旧社会，建国初期我刚满二十岁，人生中正好干工作的时期就遇上了极“左”年代，并且遭遇了无妄之灾。精神上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一直延续了几十年，欣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政策才得以冰消雪解。今天，冤狱早已澄清，加害于人者或奉命行事者，有的

已经有所省悟。有的已经作古，而那个害人不当回事的极“左”年代也已悄然远去，我的心中也早已释然，无意深怨当年害我之人，因为那个年代就时兴那样的风气，灵魂被扭曲是常见的现象，蒙冤被屈的也并非我一人，有的比我更加悲惨，甚至熬不过、挺不住而失去了生命。今天我把这两件事写出来，是告诫人们要记住这段历史，希望人为的灾害再也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一、所谓“包庇放走反革命分子”案

1951年春，我二十三、四岁，在巩县城关区任副区长、驻老城乡工作队队长。一天上午，区委宣传委员胡桂轩由县委会开会回来，对我说：“老城乡王沟村有个叫刘淑斌的曾参与逮捕我皮部专署司法科长贾谦益，县委要求把他逮捕送县。”我回到老城乡，即布置给驻王沟村的武装干事张××和区妇联委员张雪琴，中午饭后，二张将刘捕后送老城乡政府，审问中得知王沟村还有个刘淑斌，二人年龄相仿，问讯乡长钟子亮和农会主席翟喜庆等，都证明有两个刘淑斌，没法证明参与逮捕贾科长的是哪个刘淑斌，即派武装干事张××，持我写给区文书张宝来的信，送区扣押，待查清后，再作处理。

张持枪送刘到区后，张让刘立在院中，进办公室见张宝来交信，当二人走出办公室，刘踪迹皆无。当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到处寻找，没有找到。区委通知张作了书面检讨，但未给处分。

1952年二月（阴历正月初），干部集中进行反右倾战地会议，为土改复查补课运动作准备。会议进行方法，是领